

走向 2010 年的中国： 改革的步伐

乔治娜·怀德 著
吴顺虎 王检贵 译
郑超愚 校

第一章 引言

充满活力的政府

中国拥有一个活力的政府进入 21 世纪，它提倡迅速而大胆的经济改革政策。邓小平相信，只要共产党继续实现经济增长，它就能继续享有一党统治的政治权力。为了在中国再次激发增长和促进市场发展，江泽民领导的政权决心沿着邓小平的脚步，改革国有企业部门。

团结在江泽民周围的领导阶层似乎确信，政治稳定和经济充满活力的结合是可行的，这能在不破坏政党权威的前提下使得中国经济再一次繁荣。

面对一些困难的选择

高层领导们在增长优先信念的支配下，也同意面向市场的变革方向。可以想象这是一个混合经济：大企业在相当大的范围内是公共部门所有和管理，而小企业成为私营部分。福利供应、卫生、教育和基本的失业救济将由公共部门承担，私人部门将起补充作用。然而，住房和养老金供应将逐渐由人们日益增长的大量储蓄提供资金。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必须关闭、合并或以其他形式合理处置成千上万的国有企业。同时，金融部门必须资本化和现代化。

但是，什么样的变革速度是最佳的这一问题一直是众所周知的。为了保证足够快的长期增长，以提供就业机会和增加福利，改革是必然的。如果变革激发反抗，削弱稳定或危及党的统治，那么中央政府将抑制变革。社会将承受以高失业以及打破阻碍快速城市化的户籍登记制度等形式出现的社会动荡。但是对一个压力重重的社会而言，能够承受多大程度的动荡还不清楚。

亚洲危机的启示

对中国领导阶层来说，亚洲危机及其伴随的社会政治动荡包含一些深刻的教训。

在亚洲国家，由于轻率地借款、过快的扩张以及与发达国家过分密切的联

系，导致大规模的破产、大量的失业并失去了增长机会，这些国家的银行和企业部门仍面临危机。这种景象加强了中国金融部门的改革。长期以来，中国的金融部门作为向企业进行政策性贷款的一种渠道，从商业角度，尤其是从世界的角度而言是不可行的。过度的投资导致了外债，尤其是短期外债的迅速积累，这需要有宏观经济政策工具来阻止过快的投资，也需要在作出借款决策时依据市场标准即对风险的确认与成本估算来确定。在几个亚洲国家，对腐败以及在企业和公共部门间关系缺乏透明度的指控强调了实施改革的紧迫性，迫切需要建立一个能胜任的管理体制，令人信任它的公正无私。

1997 年 10 月，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的政策，以及 1998 年初新任总理朱镕基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的议会）上宣布的政策都表明，中国已经很好地吸取了这些教训。尤其加快了金融部门改革的步伐。

谨慎的依据

亚洲危机为在经济改革中采用谨慎措施提供了论据，尤其是在中国开放其不发发达资本市场的速度方面。资本市场的培育对长期资源的利用很重要。中国的外债还没有高到 GDP 的一定份额，并且它的管理部门还没有经受合理的外债支付状况的考验。但下一个 10 年，如果继续保持增长态势并广泛扩张，中国将需要大量地输入外国资本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吸引外国资本和借贷的一揽子资金组合将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这将取决于稳定的环境及中国作为出口者（为借贷提供资金）和投资区域（吸引投资流入）的竞争力。这些考虑表明再次提高壁垒的预防措施是可行的。

主要是政治方面的

亚洲危机为江泽民领导阶层提供的最有说服力的教训可能是：经济变革在政治上是危险的，尤其在经济变革出了问题时。不仅在共产党内部存在着公开的争论，即需要进行政治改革，否则，党的长期生存是不可能的，党最终不能确保它的长期领导。与此同时，也存在一种容易引起城镇选民，尤其是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工作人员恼火的反对意见，他们传统上是人民共和国的特权人员。由于过快变革产生的不利因素使得他们的反对易于表达出来的，当局可能倾向于谨慎从事。

改革将继续

本报告认为，国有企业部门仍将继续改革，但它不像政府新总理所承诺的那样迅速和全面。新总理曾说改革进程将在 2000 年底以前完成。对外开放也

将继续，但它将以目前中国提出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既定速度更慎重地前进。

关于改革进程的两个假设在本报告的预测部分提出来，并没有设想改革将在目前的（第九个）五年计划结束前完成。首先，假设改革将迅速进行，经济和社会的错位在短期也相当严重。令人惊叹的生产力成就将把中国 2010 年的经济带入到 1995 年捷克共和国的水平——这是一个非凡的成就，需要集体领导阶层的空前团结，而领导集体在 21 世纪初也将经历再一次的权力移交。第二个假设是改革将缓慢进行。大多数企业的长期生存主要受地方政府的控制，这些企业的资源需求将挤占另外一些生产率更高的企业。投资和增长虽然一直相当强劲，但其速度将日益趋缓。短期来看，失业将降低，而增长将更快。但是，中西部和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将再次扩大，因为后者为了保持竞争力而加快了改革。

经济基础

在第二章，制造业、投资和出口被认为是改革时期中国增长的源泉。中国经历了两个主要的增长周期，即自 1985 年来先过热后紧缩的阶段。先是 1987 - 1988 年，后是 1993 - 1994 年，过度的投资需求引发了通货膨胀压力，这也被同期进行的价格改革所加重。政府相应地采取紧缩政策，并控制物价。在第一阶段，严厉的措施导致在农村发展起来的成千上万小型非国有企业关闭。第二轮的紧缩不那么严厉，采取的措施也更为恰当，强劲的出口支撑着经济增长，取得了通货膨胀回落与经济缓慢增长的软着陆。

在改革中，中国不寻常的快速生长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国内的高储蓄率，这支持了高投资率。虽然 90 年代初以来国内工业已积累了大量的市场剩余，但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繁荣作出了贡献。这确保了中国的外部账户保持着合理状态。这里分析了政府政策在几个重要领域的渐进发展，如财政与货币政策、价格改革、外国投资和贸易以及外汇等，也检验了低估中国经济规模和夸大经济增长率的数据差错。

社会性

第三章描述了通过改革如何消除贫困，但是不平等扩大了。在农村，那些除了谷物生产还进行多样化生产的家庭，以及那些成员在农田以外找到工作的家庭大大受益。几百万所谓的农民事实上不再依靠农业为生。与此同时，政府把财政支出花在贫困和落后地区的能力由于权力下放而受到限制，因此，再分配的能力有限。几百万出生在农村的人口迁移到城市寻找工作，而他们在城市生存也不稳定，逐渐打破城市工人的铁饭碗正加剧城市的不平等和社会的紧

走向 2010 年的中国： 改革的步伐

乔治娜·怀德 著
吴顺虎 王检贵 译
郑超愚 校

第一章 引言

充满活力的政府

中国拥有一个活力的政府进入 21 世纪，它提倡迅速而大胆的经济改革政策。邓小平相信，只要共产党继续实现经济增长，它就能继续享有一党统治的政治权力。为了在中国再次激发增长和促进市场发展，江泽民领导的政权决心沿着邓小平的脚步，改革国有企业部门。

团结在江泽民周围的领导阶层似乎确信，政治稳定和经济充满活力的结合是可行的，这能在不破坏政党权威的前提下使得中国经济再一次繁荣。

面对一些困难的选择

高层领导们在增长优先信念的支配下，也同意面向市场的变革方向。可以想象这是一个混合经济：大企业在相当大的范围内是公共部门所有和管理，而小企业成为私营部分。福利供应、卫生、教育和基本的失业救济将由公共部门承担，私人部门将起补充作用。然而，住房和养老金供应将逐渐由人们日益增长的大量储蓄提供资金。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必须关闭、合并或以其他形式合理处置成千上万的国有企业。同时，金融部门必须资本化和现代化。

但是，什么样的变革速度是最佳的这一问题一直是众所周知的。为了保证足够快的长期增长，以提供就业机会和增加福利，改革是必然的。如果变革激发反抗，削弱稳定或危及党的统治，那么中央政府将抑制变革。社会将承受以高失业以及打破阻碍快速城市化的户籍登记制度等形式出现的社会动荡。但是对一个压力重重的社会而言，能够承受多大程度的动荡还不清楚。

亚洲危机的启示

对中国领导阶层来说，亚洲危机及其伴随的社会政治动荡包含一些深刻的教训。

在亚洲国家，由于轻率地借款、过快的扩张以及与发达国家过分密切的联

系，导致大规模的破产、大量的失业并失去了增长机会，这些国家的银行和企业部门仍面临危机。这种景象加强了中国金融部门的改革。长期以来，中国的金融部门作为向企业进行政策性贷款的一种渠道，从商业角度，尤其是从世界的角度而言是不可行的。过度的投资导致了外债，尤其是短期外债的迅速积累，这需要有宏观经济政策工具来阻止过快的投资，也需要在作出借款决策时依据市场标准即对风险的确认与成本估算来确定。在几个亚洲国家，对腐败以及在企业和公共部门间关系缺乏透明度的指控强调了实施改革的紧迫性，迫切需要建立一个能胜任的管理体制，令人信任它的公正无私。

1997 年 10 月，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的政策，以及 1998 年初新任总理朱镕基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的议会）上宣布的政策都表明，中国已经很好地吸取了这些教训。尤其加快了金融部门改革的步伐。

谨慎的依据

亚洲危机为在经济改革中采用谨慎措施提供了论据，尤其是在中国开放其不发发达资本市场的速度方面。资本市场的培育对长期资源的利用很重要。中国的外债还没有高到 GDP 的一定份额，并且它的管理部门还没有经受合理的外债支付状况的考验。但下一个 10 年，如果继续保持增长态势并广泛扩张，中国将需要大量地输入外国资本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吸引外国资本和借贷的一揽子资金组合将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这将取决于稳定的环境及中国作为出口者（为借贷提供资金）和投资区域（吸引投资流入）的竞争力。这些考虑表明再次提高壁垒的预防措施是可行的。

主要是政治方面的

亚洲危机为江泽民领导阶层提供的最有说服力的教训可能是：经济变革在政治上是危险的，尤其在经济变革出了问题时。不仅在共产党内部存在着公开的争论，即需要进行政治改革，否则，党的长期生存是不可能的，党最终不能确保它的长期领导。与此同时，也存在一种容易引起城镇选民，尤其是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工作人员恼火的反对意见，他们传统上是人民共和国的特权人员。由于过快变革产生的不利因素使得他们的反对易于表达出来的，当局可能倾向于谨慎从事。

改革将继续

本报告认为，国有企业部门仍将继续改革，但它不像政府新总理所承诺的那样迅速和全面。新总理曾说改革进程将在 2000 年底以前完成。对外开放也

将继续，但它将以目前中国提出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既定速度更慎重地前进。

关于改革进程的两个假设在本报告的预测部分提出来，并没有设想改革将在目前的（第九个）五年计划结束前完成。首先，假设改革将迅速进行，经济和社会的错位在短期也相当严重。令人惊叹的生产力成就将把中国 2010 年的经济带入到 1995 年捷克共和国的水平——这是一个非凡的成就，需要集体领导阶层的空前团结，而领导集体在 21 世纪初也将经历再一次的权力移交。第二个假设是改革将缓慢进行。大多数企业的长期生存主要受地方政府的控制，这些企业的资源需求将挤占另外一些生产率更高的企业。投资和增长虽然一直相当强劲，但其速度将日益趋缓。短期来看，失业将降低，而增长将更快。但是，中西部和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将再次扩大，因为后者为了保持竞争力而加快了改革。

经济基础

在第二章，制造业、投资和出口被认为是改革时期中国增长的源泉。中国经历了两个主要的增长周期，即自 1985 年来先过热后紧缩的阶段。先是 1987 - 1988 年，后是 1993 - 1994 年，过度的投资需求引发了通货膨胀压力，这也被同期进行的价格改革所加重。政府相应地采取紧缩政策，并控制物价。在第一阶段，严厉的措施导致在农村发展起来的成千上万小型非国有企业关闭。第二轮的紧缩不那么严厉，采取的措施也更为恰当，强劲的出口支撑着经济增长，取得了通货膨胀回落与经济缓慢增长的软着陆。

在改革中，中国不寻常的快速生长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国内的高储蓄率，这支持了高投资率。虽然 90 年代初以来国内工业已积累了大量的市场剩余，但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繁荣作出了贡献。这确保了中国的外部账户保持着合理状态。这里分析了政府政策在几个重要领域的渐进发展，如财政与货币政策、价格改革、外国投资和贸易以及外汇等，也检验了低估中国经济规模和夸大经济增长率的数据差错。

社会性

第三章描述了通过改革如何消除贫困，但是不平等扩大了。在农村，那些除了谷物生产还进行多样化生产的家庭，以及那些成员在农田以外找到工作的家庭大大受益。几百万所谓的农民事实上不再依靠农业为生。与此同时，政府把财政支出花在贫困和落后地区的能力由于权力下放而受到限制，因此，再分配的能力有限。几百万出生在农村的人口迁移到城市寻找工作，而他们在城市生存也不稳定，逐渐打破城市工人的铁饭碗正加剧城市的不平等和社会的紧

统计口径深化

怀疑增长高估的另一个原因是经济统计的口径几乎改善了，因此，记载的一些增长可能简单地代表宽泛的数据统计口径。

从需求角度来看，世界银行在最近出版的《2020 年的中国》中指出，用来把名义消费和投资数据转换为实际 GDP 的通货紧缩指标，不像消费价格指数（自身可能被低估）或资本品价格指数增长那么快。用替代的通货紧缩指数重新估计增长率后得出的结论显示：以人均指标计算的增长率可能低 1.2 个百分点。这意味着，1995 年以前的 10 年，GDP 的年均增长率是 8-9%，而不是 9-10%。有资料显示这个差距扩大了，也就是 1995 年以前的 5 年的增长数据显然夸大了，因为价格指数和通货紧缩指数间的差距已经扩大。

1990—1995 年的增长接近 9% 而不是 12%

工业产出（以 1990 年价格水平的 GDP 指标度量）对电力产出的弹性在第二个五年（1991—1995 年是 1.7）比第一个五年（1.05）高得多。众所周知，至少用每单位 GDP 的初级商业能源消费指标度量的中国能源消费更有效率。每 1000 美元（1995 年价格水平）的产值中煤的消耗量已从 1980 年的 3.5 吨下降到 1995 年的 1.75 吨，在 15 年内下降了 50%，年均下降 3.3%，但以国际标准来看还是高。对初级能源效率而言，这是一种进步。即使有进步，与 1985—1990 年相比，电力的工业产出弹性在 1990—1995 年惊人的上涨还是令人生疑。要是两个时期保持相同的弹性指标（1.05），那么 1990—1995 年的工业产出年均增长指数将是 10.6%，而不是 17.5%，全部 GDP 的增长指标将是 8.7%，而不是 12%。

电力和工业产出

	1986 - 1995	1991 - 1995	1986 - 1990
工业生产（以 1990 年价格计算增长率）	13.1	17.5	9.0
电力生产（10 亿千瓦小时）	9.4	10.1	8.6
弹性	1.4	1.7	1.05

资料来源：EIU 根据世界银行《2020 年的中国》数据计算。

经济仍然被低估

要是中国经济在改革期的所有增长率被高估的话，它的整个经济规模几乎可以肯定被低估。这些证据包含：服务业占 GDP 的比例一直很低，存在大量非货币经济。也有证据表明，包括投资在内的大量经济活动没有统计在内。肯定存在但规模不清的非正规金融部门支持着一些不是完全合法的经济活动领域，这些却没有登记在案。国防部门在公共支出以及大量存在的军事工业部门经济活动也没有完全披露。

矿业和能源扮演着虽小却重要的角色

中国有包括煤炭和石油在内的大量矿藏，也是钨、锑、锡和汞等几种矿产的重要出口国。要是商业的开采行之有效，中国在能源方面可以自给自足（也仅仅是恰好），而很多的矿物可能是一个潜在大规模的出口国。由于在 20 世纪 80 年代依靠原油出口获得了外汇盈余的大部分，中国不再是一个石油净出口国，在未来几年内还可能成为一个大的进口国。迄今为止，在近海勘察石油和天然气的努力也没有获得什么成果，却导致了 20 世纪 80 年代第一轮的外国直接投资大量输入。但是，在边远的西部和西北部的内陆地区却有望获得更好的结果。

从整体上看，矿业在经济中扮演一个小角色，占 GDP 的比例不到 1.5%。公用事业在用生产方法计算 GDP 时包括在工业之内，比起全部工业生产而言，倾向于更缓慢地增长。电力或原始能源产出一位数的典型年增长率和近年 GDP 增长率的较大差异，已经导致对 20 世纪 90 年代（1991—1996 年年均增长 12%）两位数增长率真实性的许多疑问。

建筑业增长迅速

20 世纪 90 年代，由于大多数城市建设繁荣，地方和中央政府大力投资基础设施，建筑业一直持续快速地增长。建筑业占 GDP 的比例从 1990 年（萧条的一年）的 4.6% 上升到 1996 年的 6.7%。从 1993 年后，尽力减缓建筑业的增长，尤其是控制房地产或其他“非生产性”项目，如高尔夫球场和宾馆，已经部分地放慢了整体经济增长。

服务业仍然滞后

在改革以前，甚至在改革期间，尽管庞大的公共部门意味着政府服务业在经济中起着主要作用，但中国一直忽视服务业的发展。然而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服务业呈现多元化发展势头，许多个人从事家庭经营的服务业。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出现了许多以前不得广泛获得的服务需求。1995 年实行每周 5 天工作制刺激了休闲消费和旅游，到中国内地旅游成为一种主要的外汇赚取渠道；在收支平衡表中，旅游账户盈余在 10 亿美元左右。1996 年，经常账户中旅游业收入达 102 亿美元，而中国居民到国外旅游的支出是 45 亿美元。第三产业在以当年价格计算的 GDP 中的贡献，已从 1980 年的 21.4% 上升到 1990 年的 31.2%（见表 2.3）。但在 20 世纪 90 年代，由于第三产业的年均增长率逐渐落后于 GDP 的增长率，因此第三产业在 GDP 中的比例逐渐下降。这部分地反映了服务业活动不合理的度量，尤其是采用了一个比较窄的统计口径。

表 2.3 建筑业和服务业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1 - 1996
建筑业								
占 GDP 的% ^①	4.6	4.7	5.3	6.6	6.4	5.6	6.7	-
逐年增长 (%) ^②	1.2	9.6	21.0	18.0	13.7	12.4	8.5	13.4
第三产业								
占 GDP 的% ^①	31.2	33.4	34.3	32.3	32.0	31.2	30.7	-
逐年增长 (%) ^②	2.3	8.8	12.4	10.7	9.6	8.4	7.8	9.6
运输								
占 GDP 的% ^①	6.2	6.5	6.3	6.1	5.7	5.2	5.1	-
逐年增长 (%) ^②	8.6	11.2	10.5	12.4	9.5	12.0	12.0	11.3
贸易								
占 GDP 的% ^①	7.6	9.6	10.3	8.9	8.7	8.4	8.1	-
逐年增长 (%) ^②	-4.7	4.6	13.1	6.6	7.7	5.9	5.4	7.2

注： 当年价格； 1978 年价格。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1997》。

运输和通讯受到政府关注

在改革以前，运输和通讯是一个被人忽视的领域，毛泽东首先考虑的是建立一个足以防卫和保证政治继承的体系。居住地是固定的，人口流动几乎没有自由。中央政府疯狂地鼓励地方自给自足，这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地区间的贸易流动。各省自给自足的趋势由于落后的交通系统反过来得到了加强，交通系统主要是由技术落后的铁路系统组成，这个系统主要任务是运输原煤。除了西藏，各个省尽管有铁路线连接，1949 年后新建的铁路主要是在西部贯穿南北的（北）京广（州）线。东部沿海的铁路系统因而严重受阻。

铁路和公路建设迅速

铁路一直主宰着运输网，1996 年它占货物运输量（吨公里）的 37%，旅客周转量（人公里）的 36%。全国铁路货物运输的一半几乎是原煤和焦炭。很多新路线正在建设中（一些与外资合作）。在东部，一条新的内陆南北线（北京——广州），也就是有名的京九线，以有史以来最快的速度完成，并于 1997 年底开通。进一步的电气化和双轨铺设等扩建部分正在进行之中。

到 1996 年底，能行驶的机动车有 1100 万辆。自 1991 年来，机动车总量年均递增 12.7%。到 1996 年底，公路网总里程达到 1185800 公里，但在 1992 - 1996 这 5 年间，年平均递增只有 2.6%。政府优先考虑公路建设支出（1996 年

列出 2231 项在建公路项目），但仍不能满足需求。像在这个地区的其他地方，交通阻塞是中国公路的一个特征。公路系统中柏油路的比例已从 1978 年的 73% 上升到 91%。1994 年，一条私人投资建设的收费公路（深圳到广州）开通后，缩短了到香港的旅行时间。

在扬子江筑坝

内陆河流是运输的一种重要方式，尽管像公路一样，大多数河流分布在中国的东部和南部。北方的水域正逐渐淤塞，冬春两季进入枯水期，而东北的水域几乎半年时间结冰。随着 1997 年 11 月在湖北省三斗坪开工修筑三峡大坝，一项把 5 条主要河流（扬子江、珠江、淮河、黄河、汉江）连接起来的雄心勃勃的计划向前迈出了第一步。沿长江北岸，一条用于继续通航和分洪的渠道已投入使用。一条长 302 米、宽 21 米，位于临时船闸下游 1 公里的秦家沱大桥，已于 10 月通车。

另一个优先考虑的是完善港口并使之现代化：正在进行的一个主要投资项目是改善现有的港口设施，尤其是秦皇岛、天津和上海 3 个港口，并新建一些设施。一个用于与台湾进行直接贸易的新港口正在福建修建。1993 年开放了 19 个新的深水泊位，但贸易海岸的拥挤一直还是个难题。1994 年 7 月，设在燕田的深圳经济特区港口对外开放。这个港口由香港私人投资兴建，它有可能成为一个在货物吞吐量上可以与香港口岸相匹敌的大港口，大约 40% 的中国贸易经由这里。

民航和通讯蓬勃发展

民航正在蓬勃发展，1991 - 1996 年间旅客和货物周转量年平均增长 20%。航空系统 1988 年开始改革，中国民航管理局成为全国管理机构，中国现在有 30 多个独立的航空公司，成为飞机的主要购买商。外国航空公司和中国相互开辟新的航线。全国航空港迅速扩张。

主要地区中心之间以及它们与外界之间的通讯网络现在已经建设完毕，通讯现在仅仅是边远地区的一个问题。尽管如此，私人电话一直是少数人的特权，租用电话的过程在城市可能拖得很长，在那里，外国公司和居民的数量正迅速增加。中国已经获得了卫星通讯技术。1994 年，中国的第一颗商业卫星亚太 1 号发射成功，这颗卫星的所有权是国际财团。

银行系统正在变革

中国的银行和金融系统一直处于变革之中。金融系统包括中央银行和正规的国内银行系统，前者是处于最高层的中国人民银行，后者包括 3 个层次：国

有专业银行、商业银行和地方的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也有大量官方的非正式信用合作组织，它们通常在农村经营，一般也收取支付货币市场平衡的利率。而正规金融部门的利率受到管制，直到最近，这个利率的实际水平一般是负数。以前受管制的信贷系统逐渐沿着市场化的方向演变。

与其他国家的结构比较

中国与亚洲的另两个发展中国家（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和一个发达国家（韩国）的比较（表 2.4）表明：制造业在改革期间继续在经济中占据过大比例。尽管印度尼西亚的制造业在追求多元化发展中不断增长，但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制造业在 GDP 中都只占很小一部分。虽然中国公共部门的服务业不可能是很小的一部分，但中国经济中服务业的份额比印度、印度尼西亚和韩国都小。正如所指出的，这部分反映了度量方法的失误，因为服务业经济由小规模的家庭经营，这很难在官方数据中反映出来。正如下面将要指出的，这反映了在过去 20 年中，虽然其他部门也在增长，但它缓慢地增长，而制造业和出口部门以极不寻常的速度快速增长。

表 2.4 经济的生产结构

（占 GDP%）

	农业		工业		制造业		服务业	
	1980	1995	1980	1995	1980	1995	1980	1995
中国	30	21	49	48	41	38	21	31
印度	38	29	26	29	18	19	36	41
印度尼西亚	24	17	42	42	13	24	34	41
韩国	15	7	40	43	29	27	45	50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 1997》。

表 2.5 银行：国有银行信贷资金的来源和用途

（10亿元；年末余额；除非特别注明）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全部	2061.4	2426.9	2987.2	4090.3	5138.1	6324.7
来源						
储蓄	1486.4	1889.1	2323.0	2933.1	3878.3	4959.3
国际金融机构贷款	18.5	23.6	21.7	21.7	38.2	29.5
债券	13.4	16.3	9.9	82.5	166.4	246.5
通货	317.8	433.6	586.5	728.9	788.5	880.2
银行资金	148.2	182.2	220.7	227.4	227.2	274.5
其他	77.1	- 117.9	- 174.6	96.7	39.5	- 65.4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用途						
工业生产企业贷款	423.6	495.6	604.7	720.9	878.9	1078.2
工业供应与市场贷款	69.7	81.9	97.4	101.7	106.3	111.8
商业企业贷款	669.1	767.8	903.7	1005.3	1216.3	1441.7
建筑企业贷款	71.5	90.6	105.2	111.7	103.5	169.5
个体经营者贷款	1.7	2.3	3.4	5.3	3.4	5.4
城镇集体与家庭贷款	93.5	114.4	136.5	114.2	106.6	120.0
农业贷款	120.9	144.9	172.0	155.4	192.2	236.8
固定资产贷款	304.4	392.5	517.1	801.1	1002.6	1203.4
其他贷款	50.1	71.7	106.0	228.5	329.5	376.6
政府债务	106.8	124.1	158.2	168.7	158.2	158.2
外汇	122.8	110.2	87.6	450.4	677.4	957.9
其他	27.3	30.9	95.4	227.1	363.2	465.2
备注						
农村信用合作组织（个数）	368406	333051	339942	350813	365492	n/a
农村信用合作组织存款	271.0	347.8	429.7	568.1	717.3	n/a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金融概览》。

表 2.6 货币供给与信贷

（10 亿元；年末；除非特别说明）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通货	317.4	432.9	577.7	728.4	788.2	880.2
储蓄需求	505.6	669.1	969.3	1239.0	1520.2	1971.3
M ₁	898.8	1171.4	1676.1	2154.0	2559.7	2851.5
M ₁ 增长率（%）	28.2	30.3	43.1	28.5	18.8	19.8
准货币	961.1	1261.3	1797.9	2538.0	3514.7	4758.0
M ₂	1859.9	2432.7	3474.0	4692.0	6074.4	7609.5
M ₂ 增长率（%）	26.7	30.8	42.8	35.1	29.5	25.3
国内信贷	2133.7	2632.3	3294.3	4081.0	5053.8	6115.3
国内信贷增长率（%）	20.0	22.3	42.1	23.8	22.8	25.5
对中央政府债权要求（净）	58.2	101.1	118.4	133.3	132.3	218.0
对国内其他部门债权要求	1944.5	2348.9	3362.7	4177.1	5161.3	6817.6
货币当局净外国资产	145.6	168.5	222.3	506.5	638.5	1068.2

资料来源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 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金融年鉴 1998》。

表 2.7 利息率

(每年 %)

	1990 年 8 月	1991 年 4 月	1993 年 5 月	1994 年 7 月	1996 年 5 月	1996 年 8 月	1997 年 10 月
储蓄 ^①	8.64	7.56	9.18	10.98	9.18	7.47	5.67
借款 ^②	9.36	8.64	9.36	10.98	10.98	10.08	8.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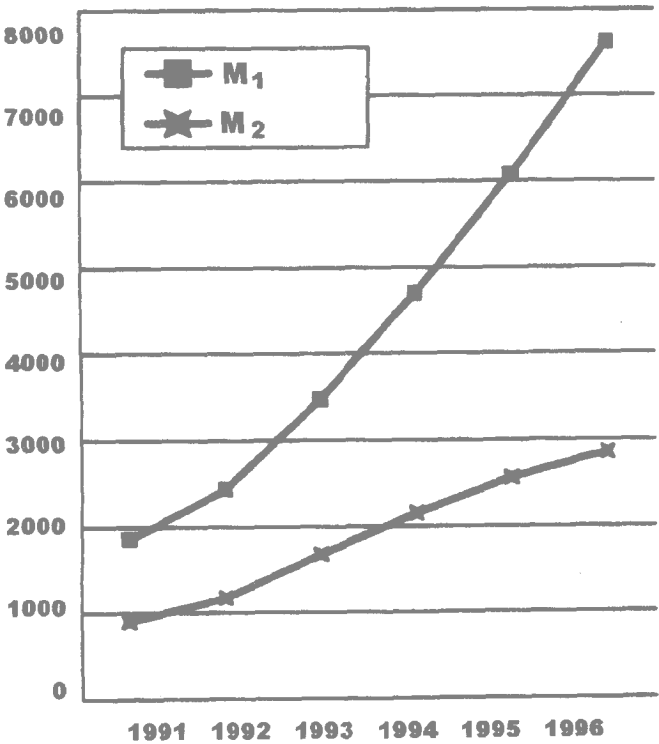
注： 个人储蓄； 流动资金。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1997》。

需求面的 GDP

投资拉动增长

图 2.1 货币供应量增长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从需求角度看，投资和出口推动了经济增长。用当年价格计算的国内总投资占 GDP 的比例从 1979 年的 28% 上升到 1995 年的 30% ,紧 随 1989 - 1990 年的衰退之后，这一比例在 1990 年大幅下降，1995 年这一指标又回升到 35% (见表 2.9)。出口占 GDP 的比例在同一时期也发生了剧烈的攀升，从 1979 年